

社会学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人口流出的主要特征、问题及其对策

陆杰华, 郭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京津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河北省人口流出的形式也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总的来看,河北流动人口主要流向经济较为发达或发展较快的地区,以改善经济条件为流动的主要原因。从社会人口学特征来看,河北流出人口中农村占比较高,男性比例较高,且较多为短距离流动,其受教育程度主要是中学水平且以初中居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和雄安新区设立的新契机之下,要实现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出,破解人口流出的负面问题、区域发展不均衡难题以及留守老人和儿童的难题,需要在科学规划、产业经济均衡发展、通过户籍改革促进城镇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统筹安排,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流动人口;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C92 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6378(2018)03 0096 10

一、研究背景

人口迁移和流动不仅是学界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也是反映并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人口加速转移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阶段半年以上人口总数达到26 139万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22 143万人。到2015年,这一对数字分别增长为29 247万人和24 597万人,分别增长了10%以上(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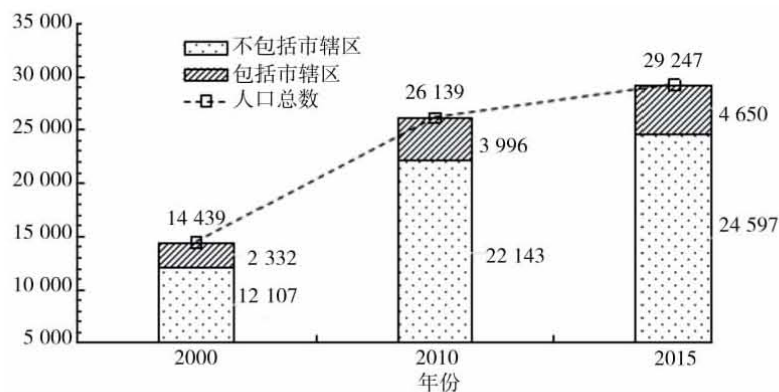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阶段半年以上人口总数(万人)

数据来源:2000/2010年人口普查,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

收稿日期:2018 01 21

作者简介:陆杰华(1960—),男,辽宁沈阳人,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老年人口学。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以及雄安新区的设立,深入研究和讨论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河北省人口流出已经成为理论热点和政策焦点^[2-5]。位于华北平原的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之一,同时也是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和环渤海区域核心。京津冀地区紧邻东北、中部地区,毗邻渤海,经济地位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总量也大幅增长。2000年区域总人口9 010.23万人,到2015年总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11亿人,这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增量为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6]。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双核心的京津二市,是吸引流动人口的主体,2015年两市常住非户籍人口数量分别为822.6万人和520.05万人。河北则是流出人口的主体,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流出人口已经超过350万人,而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河北流出人口超过420万人。北京和天津分别是河北省流动人口的第一、第二目的地,近2/3的河北流动人口流入了京津两地(图2)。在河北全省范围内,只有唐山、秦皇岛、廊坊和石家庄属于人口净流入地区,其他地市均为净流出地。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廊坊等城市或是由于自身的工业基础雄厚,或是区位优势优越(临海或毗邻京津),这种优势也使其能吸引更多周边地区的劳动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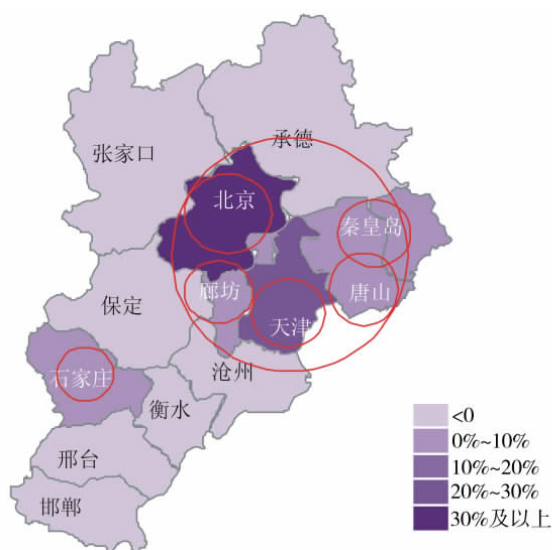


图2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三地人口分布情况

人口因素是决定城市圈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7]。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平衡,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与否直接影响着城市圈城镇体系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城市圈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8]。北京和天津有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完善的产业结构,而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北,与京津二市发展差距明显。这种区域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导致了城市圈内部各个城市之间没有形成有序的发展梯度。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河北省在政策对接、产业发展和调整方面将迎来更多的利好消息^[9]。但在目前的人口分布和流动格局下,这种失衡的人口发展态势不利于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因此,要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大局就必须弥补短板,关注人口流出地的发展状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京津冀三地将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解决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状态,加快城市一体化建设,力图打造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格局。

二、河北省人口流出的历史演进

(一)河北省流动人口的总量演变

河北省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北京等发达地区较为落后。因此,

河北省人口迁移始终以流出人口为主导,流出人口总量大于流入人口。通过2000—2015年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省外流入”“流出省外”等角度大致描绘出河北跨省流动人口历年变化的总量和趋势。图3展示了河北流动人口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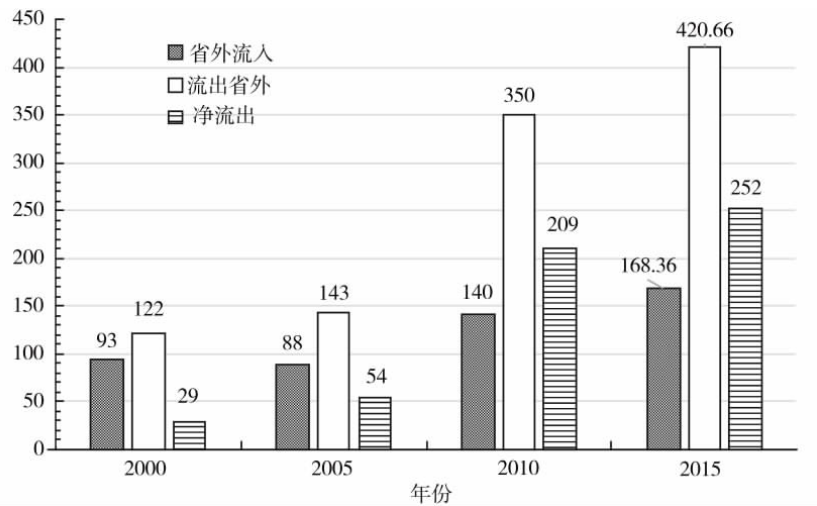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15年河北省人口流动情况(万人)

从总体上看,历次调查都显示出总流量和分流量的上升:无论是从省外流入的人口总量,还是流出省外的人口,乃至净流出人口的总量,都在大幅上升。这个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趋势,与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总量大幅增加密不可分。

从增长幅度来看,2000—2005年的增幅远远小于2005—2010年的增幅,2010—2015年虽然增幅仅有20%,但流动人口总量则创下新高。其中,在2000—2005年,流出人口增加了21万人左右,但省外流入人口反而减少了5万人左右。因此,净流出人口从2000年的28.85万人增长为2005年的54.16万人。2005—2010年的增幅则出现了急剧地提升,流到省外的人口总数从143万人飙升至350万人,增长了207万人左右,增幅接近145%;与此同时,省外流入人口也增长了52万人,达到140.47万人。2010—2015年,流到省外的人口进一步增长到420万人,流入河北省的人口总量也增至168万人,净流出人口超过25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跨省流动人口总体而言比例较低。其中,2000年(常住人口6674万人)跨省流出人口仅占总人口比重的1.83%,2005年(常住人口6851万人)增长为2.09%,2010年(常住人口7194万人)则增长为4.87%,2015年(常住人口7424.92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占总人口5.67%。

(二)河北省流出人口分布情况

从总量上来看,2015年河北流出人口总数为420.66万人。从河北流出人口最主要的目的地可以看出,这些流动人口分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流动距离短;趋向改善生活水平;流动地区较为集中。具体体现为:(1)向就近经济发达的京津两市流动,流动距离短。紧邻的天津和北京两地,是河北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流入北京的人口总数为181.88万人,占河北总外流人数的43.24%;天津市有近90万流入,占河北外流人口总数的21.4%,河北流动到天津和北京两地的人口总比重达到了64.5%,这也意味着河北有近2/3的流动人口流入了京津二市。(2)华北地区其他周边省份。由于毗邻的关系,这几个省份也接纳了相当大部分的河北流出人口:内蒙古占有3.61%,山东省占有3.47%,山西省为2.47%,辽宁省为1.84%。这些省份总和为11.34%。(3)沿海发达地区。其中,江苏、上海、广东三地分别为2.88%、2.31%、2.74%,加总可得,这些沿海省市流入的人口占河北流出总人口的7.67%。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人口流出的主要特征

根据 2015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可以大致从户籍比重、流动距离、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受教育程度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特征来刻画河北流动人口的具体特征。总的来看,河北流出人口中农村占比较高,男性比例较高,且较多为短距离流动。这部分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主要是中学程度且以初中居多,以改善经济条件为流动的主要原因。

(一)流动人口比重呈现“一低两高”特点

整体来看,河北流动人口整体比重较低,短距离流动比重较高,农业户籍比重较高。其中,以县为单位的流动人口仅占 13.27%,而以乡为单位的流动人口占比 17.95%。这说明,第一,在河北省范围内,流动人口比例远低于留守人口的比重,人口流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表明河北流动人口短距离流动较多,有 4.7 个百分点的人口只是在县内跨乡流动,这部分人口占到流动人口总数的 26%。也就是说,1/4 的流动人口只是短距离的县内流动人口。第三,流出地数据表明,在户籍结构中占据绝对大多数的都是农业户籍,比重接近 90%。非农户籍只占到了 10%,比例较小。可以说,农业户籍人口是流动人口的绝对主力。

(二)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失衡

1. 两种口径人口金字塔年龄/性别结构相似。图 4 中两幅图是分别基于“以县为单位”和“以乡为单位”两个统计口径绘制而成。数据中得到的人口年龄结构较为相似,均为“两高两低”。区别则在于“以乡为单位”的口径中,低年龄组人群比重相对更高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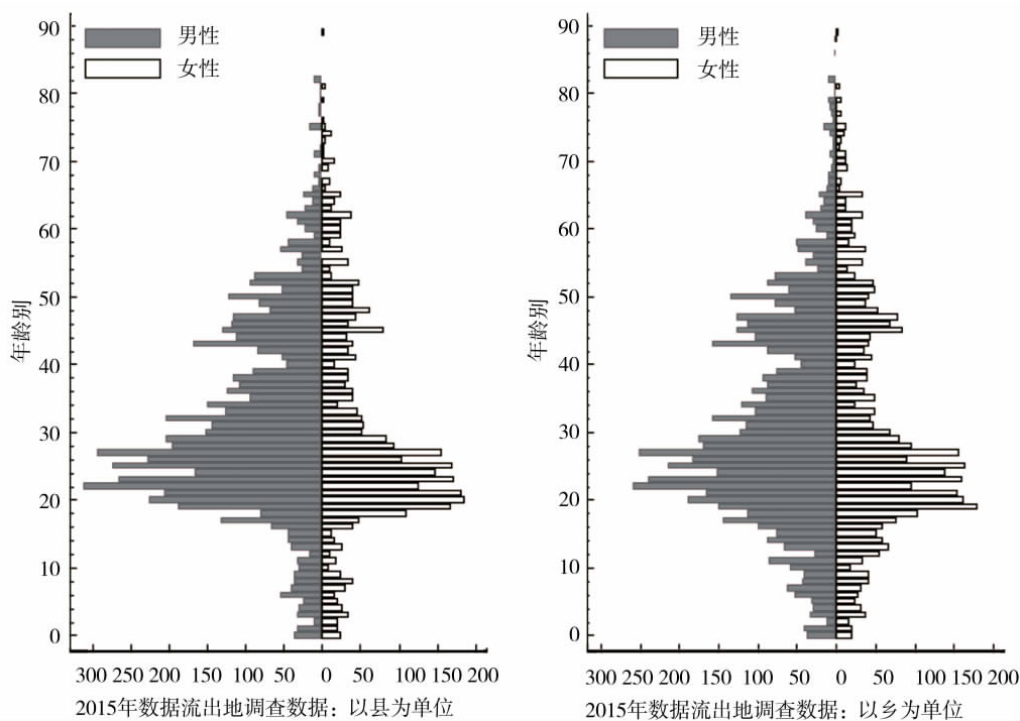


图 4 流出地两种口径的流动人口年龄金字塔

基于流出地调查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体现出“两高两低”的分布形态:(1)两高:青年和中年流动人口比重较高。分别来看,20—30 岁年龄组人群比重最高,40—50 岁组人群所占比重次高;(2)两低:老年及幼年流动人口比重较低,其中低年龄组(0—14 岁)比重较低,高龄组(55 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比重也相对较低;

(3)值得注意的是,30—40岁的人群所占比例反而不高,并处于下降区间;(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中男性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女性的比例,尤其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的数量优势更为突出。

2. 流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分析。总体而言,流出地中两种统计口径得到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非常相似:两种统计口径的男性流动人口的总量和比例都要高于女性,性别比也严重失衡。以县为单位和以乡为单位的两种视角下的男性流动人口占比分别为64.98%和61.53%,性别比分别为185.55和159.94,跨县流动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更加明显(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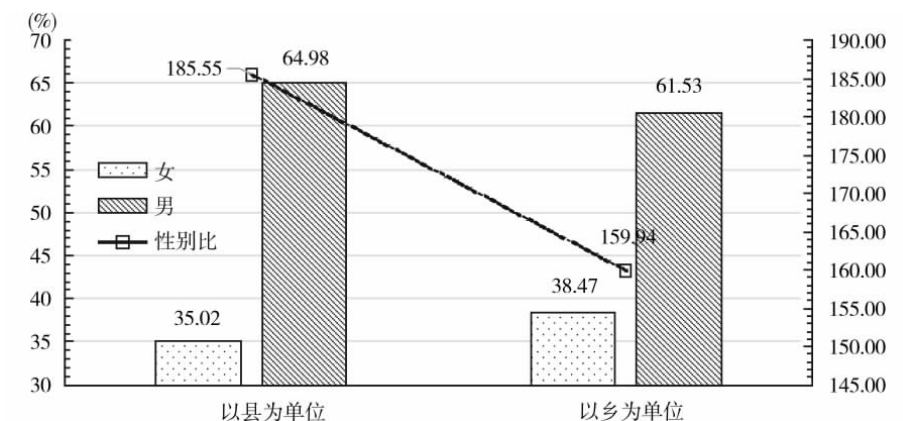


图5 基于不同口径的流动人口性别比例和性别比

进一步通过对比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数量结构,可以发现二者有明显的共性和差异。

从共性看,男女两个组别中,低龄组(0—14岁)和高龄组(60岁及以上)人群比重较低,其比重和变化趋势也近似。低龄组中每个年龄别人口所占比重基本相同,而高龄组中每个年龄别人口所占比重则逐渐下降。相应地,在20—59岁的劳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占各自总体比重都比较大。劳动力占流动人口的大部分比重,表明外出务工是决定河北流动人口外出的重要因素。不同点则在于,20—30岁女性青壮年劳动人口比例最高,其他年龄段(30—60岁)的女性劳动者比例接近;相比较而言,男性在20—30岁组人口比重最高,40—50岁组人口比重属于次高峰,在这两者之间,30—40岁组人群比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

而从性别结构来看,在15—59岁劳动力年龄段,尽管男性比例出现些许波动,但几乎所有年龄组的男性数量都超过女性数量,每个年龄别都体现出性别失衡的态势。这进一步强化了男女流动人口总体性别失衡的状态。

3. 分年龄组比较:“两低一高”,青壮年劳动力倾向远距离流出。从分年龄组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不同统计口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区别(图6)。首先,与人口金字塔的结构类似,“以县为单位”和“以乡为单位”两个统计口径展现出相似的“两低一高”的人口结构,都是低龄组(0—14岁)和高龄组(60岁及以上)所占比例较低,而青壮年劳动力人群比重较高。这也说明,在数据中体现更多的是外出务工人员的数据,因而青壮年劳动力所占比重高。20—24岁组人群所占比重最高,其中“以县为单位”的口径中,这个年龄组人群占比为19.95%,而“以乡为单位”的口径中,占比为17.26%。中老年人比重较低,55—59岁人群比例较上一个群体有显著的下降,并随着年龄增长,各个年龄组所占比重也迅速降低。其次,从各个年龄组的占比来看,“以县为单位”的统计数据中劳动力人口(20—59岁各组)比重几乎都超过(或持平)了“以乡为单位”的数字。相比之下,低龄组人口和高龄组人口则是“以乡为单位”的口径中占比更大。这同样也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更倾向于较长距离的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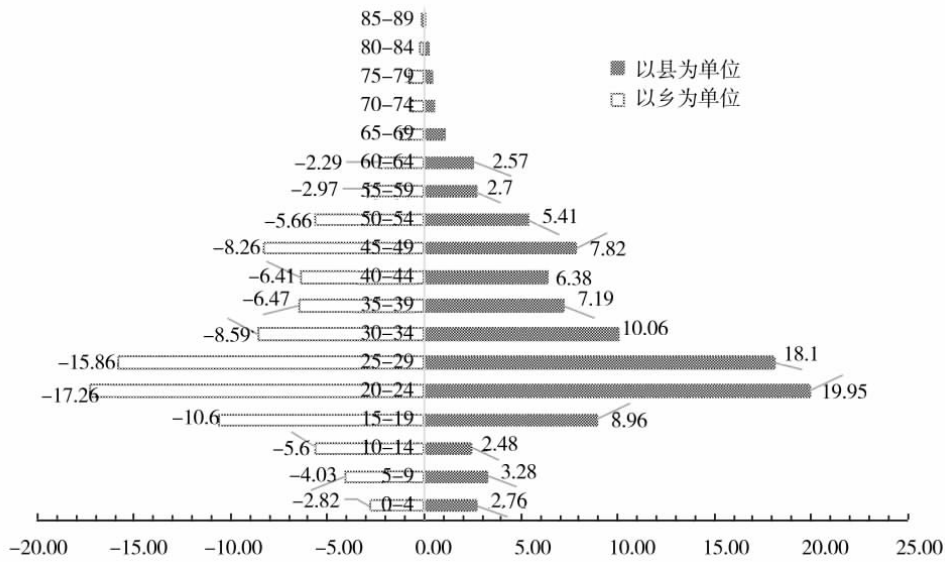


图6 两种口径的流动人口年龄组别比较(%)

(三)受教育程度:中学教育为主,高等教育比例升高

总体来看,受过中学教育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图7)。其中,仅初中教育程度流动人口就达到50%,而接受过高中程度教育的流动人口比重也达到13%~15%。加总来看,接受过中学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比重超过六成,可以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以中学教育为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处于22%~25%区间。高等教育比例较高,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占有了更大的比例。

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的重心正在不断向更高的程度移动。但是在流出地数据的两种口径中,统计数字的比例差异较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同质性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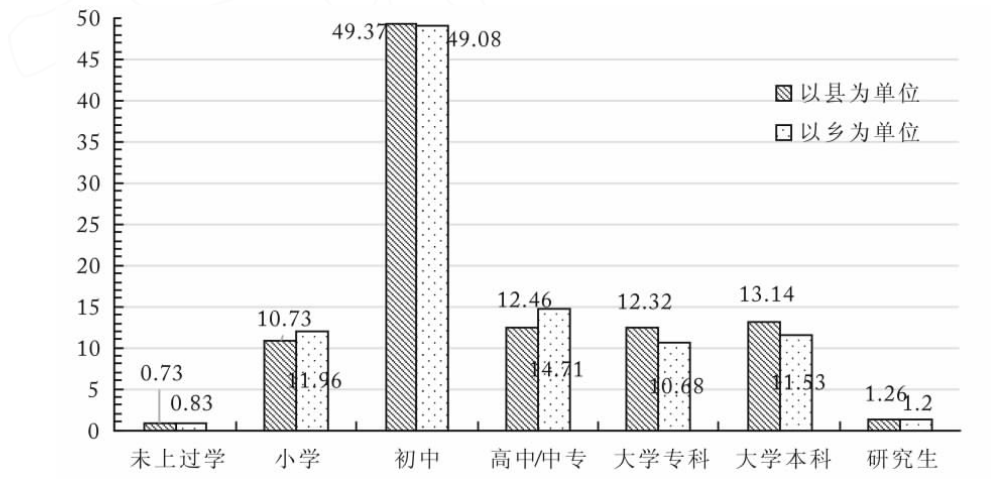


图7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四)婚姻结构:流出地已婚比例优势明显,流入地已婚比例优势较小

从婚姻结构来看,已婚(初婚)群体与未婚群体差距不大。在“以县为单位”和“以乡为单位”的两个口径中,已婚群体都仅有48%左右的人口,未婚群体也占到了48%左右。此外,其他三个群体“再婚”“离婚”“丧偶”群体比重较低,其总和不超过4%。

(五)河北流出人口的其他社会经济特征

1. 务工经商是最主要的流动原因,属于生存发展型流动模式。在流出地数据中,同样占比最多的务工经商人群,分担了超过六成的流动人口;而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人口比重,则达到了20.9%,所占比例也居于第二位。这也说明,流动人口流动的动机更多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属于生存发展型流动。

2. 流动人口在外时间普遍低于10年。从总体上来看,超过九成的流动人口在外时间低于10年。而居住时长小于9年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几个时间段:(1)流动1—2年的流动人口占比为28.42%,所占比例也在各个时间段中居首;(2)流动时间小于1年的,所占比例为26.37%,在各个时间段中居第二位;(3)3—4年的流动时长,所占比例为22.39%,在各个时间段中居第三位;(4)5—9年流动时长,占比12.64%。因此,小于10年的流动人口比重超过了90%。

3. 接近六成流动人口家庭总人口 ≥ 4 人,一孩和二孩的流动人口家庭比例超过八成。流出人口中,三口之家所占比例仅有21.62%,加上双人户和单人户的比重,也仅有40%左右的独生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相比较来看,扩展家庭的比重则更高。四人家庭比重超过20%,五口人家庭也有17.01%的比重,六口人及以上的家庭比重甚至接近21.55%,这三类家庭总比例达到60%左右。这也说明,扩展家庭所占比例更高,家中总人口越多,越有可能有做出外出流动的决策。

从子女数量来看,一到两个子女的比例最高,两者比例之和超过八成。其中,独生子女所占比例最高,约为42%~56%;二孩生育比例也较高,约占33%~41%。不过,多孩的家庭比例相对较少,如三孩及以上多孩家庭比例为3%~11%之间,暂无子女家庭比例也较低,仅为6%~8%。

4. 家庭月平均收支水平。从家庭收入的十分位数来看,月均总收入为4000元以下的较低收入人群总的占比达到30%左右,4000~8000元月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同样为50%左右,而剩下的高收入人群占比为20%左右。可以得到收入的中位数约为6000元,总体上看,流动人口的家庭月均收入相对较高。

从每月支出的十分位数来看,家庭月均总支出2500元以下的几组人群总的占比达到30%左右,2500~5000元月收入的中等支出群体比例为40%左右,亦即大多数人的月均支出相对较少,在5000元以下。而剩下的高支出人群占比为20%左右。流动人口的家庭月均支出相对较低,考虑到相对较高的家庭月收入,每月经济盈余会相对较多,这也进一步说明物质激励对于外出务工经商的决策制定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人口流出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京津冀人口流动向心力和离心力定律亟待破解

目前,河北省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等发面仍与京津地区存在巨大差距,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生活质量等因素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吸引京津冀地区的人口不断流向京津地区。通过“虹吸效应”^[10],京津地区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及资金、科学技术等,这不仅造成了河北发展的乏力,也使得京津冀区域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如果国家不从宏观层面对此加以调控,京津地区与河北的发展差距将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性。

人力资本存量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前提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人口和劳动力群体的适度聚集。因此,在局部地区过度的人口聚集反而会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11]。众所周知,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导致河北省与京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在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人口流动面临的突出挑战之一就是如何破解京津冀人口流动向心力和离心力定律,合理分配人力资本提高河北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减少河北省在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时的阻力。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就地就近吸纳就业模式尚未形成

2006—2012年,河北地区中小城市建成区人口占全部城市建成区人口的比重由14.5%下降到

10.6%,平均人口由19.40万人下降到18.63万人,下降了4%。在产业功能方面,中小城市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城市的比重由16.8%下降到14%,平均非农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低于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在吸纳就业能力方面,中小城市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城市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由9.4%下降到7.6%,平均就业人员年均增速低于同期超大城市的年均增长速度。河北省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区域内的中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吸纳就业功能不足,城市功能落后^[12]。这就使得河北省的人口更倾向于向京津地区流动,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因而,如何提高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使这类人群能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是河北省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对于缓解京津地区的人口压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区域间公共基础设施落差明显格局亟待改变

交通一体化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跨区域交通建设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的人口流动、经济有效融合、激发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活力具有关键作用。但交通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京津冀三地的交通发展水平与规模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建设施工不同步、标准不统一,在河北与京津对接的许多地方,目前仍然存在着“断头路”和“瓶颈路”,许多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没有直接可达的交通通道,满足不了交通需求,并形成交通“瓶颈”^[13]。最重要的一点,实现交通一体化需要京津冀三地政府巨大的财政投入,而河北省的地方财力难以支撑。2014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的负债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财政压力巨大。除了交通资源,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以及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资源在京津冀地区间的分布也非常不均。河北省在公共服务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方面同样与京津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使得生产要素加速向京津地区聚集,三地的发展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

(四)人口外流的负面效应亟待消解

人口外流给河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何消解这些负面效应,是河北省面临的重大挑战。京津地区以其更高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社会政治优势对河北省人口产生了巨大的拉力,而河北省因社会经济发展落后,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社会公共服务落后等因素不能留住本地的劳动力,劳动力的缺乏又反过来使河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人口外流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才外流,高素质人才在河北省缺乏合适的发展空间,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这使得人才分布在京津冀地区也非常不均。人才外流、高素质人才缺乏使河北省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发展速度缓慢,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京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弱,“就业效应”微弱^[14]。人口流出也将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负面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将不利于河北省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不利于河北省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对人口的吸引力将进一步被削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如何留住劳动力、帮助缓解京津地区的人口压力,是河北省面临的重大挑战^[15]。

(五)留守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亟待关注

河北省流出人口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以及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是河北省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河北省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留守儿童的监护以及教育问题关系到河北省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水平,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帮助这部分儿童更好地接受教育、健康成长。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外出务工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步遭到瓦解,留守老人的养老状况不容乐观。河北省政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留守人群的生活质量。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的政策建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首先应该做到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和优势互补,以人为本,通过政府统筹协调、引导和市场主导,实现河北省流动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出,需要在科学规划、产业经济均衡发展、通过户

籍改革促进城镇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做足文章。

(一)制定好协同发展规划蓝图,促进“三规合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还存在区域功能配置不当,城市、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等布局失衡,以及区域发展落差持续扩大等问题^[16-17]。因此需要做到“三规合一”,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机融合,兼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确保区域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相互衔接,协调发展。

河北省人口的有序流动建立在京津冀区域内清晰的功能定位基础之上。北京要强化城市战略定位,划定城市边界和生态红线,严格管控中心城区的开发强度,在更大腹地内进行城市功能的分散化布局,着力加快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建设,在北京周边区域规划建设若干特色“微中心”。还要利用雄安新区设立的良好契机,带动区域联动发展格局,打造京津冀区域性城市群,促进本地区协同发展。

(二)优化资源配置,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弥补河北省经济短板

人口流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利益的获取,因此人口流动大都是由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不成熟的市场流向成熟市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不仅是推进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是资本、技术、产权更是人口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过程。河北省人口的有序流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区域内经济发展是否协调、产业布局是否合理、城镇建设是否到位的共同影响。因此人口的有序流动必须与区域协同相配套,通过区域的共同发展来实现人口的优化配置。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分工合作,使教育、信息、资本和社会服务等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促进河北省产业升级,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进一步为留住人才吸引落户创造有利条件^[18-19]。

(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制度障碍,促进城镇建设

影响城镇建设的各项制度中以户籍制度尤为显著^[20],由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歧视严重影响了人口的合理布局^[21]。因此,要优化京津冀人口分布,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在政策上需弱化户籍制度造成的福利差异。通过京津冀三地在户籍政策上的协同,逐步弱化户籍与福利的关联度,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地区制度差异所带来空间异质性对人口流向的影响程度。

不仅如此,城镇体系是区域一体化的骨架和支撑。京津冀城市圈城镇体系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河北省的大中小城市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京津两市。因此京津冀城镇体系中的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的范围较小,对其外围城市的辐射作用则更弱,整个城市群经济扩散效应缓慢。由于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一方面使得京津与其周围城市区位差距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发展不足,难以承接中心城市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对京津的经济支撑力不足。因此,促进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动,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需要通过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搭乘雄安新区设立的东风,加快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大发挥城镇化对人口流动的引导作用,减轻北京人口压力,实现人口合理分布^[22]。

(四)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由于河北省与京津在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方面存在较大落差,对留住京津两地转移过来的人才造成了压力和挑战。因此,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引导,通过加强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修补周边区域公共服务短板,缩小与北京、天津的差距;另一方面,要结合教育、医疗等非首都功能疏解,提高周边河北省区域内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质量水平,增强承接地的吸引力。

社会保障是流动人口的保护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均衡发展教育、科技等公共事业,可以实现京津冀城市间公共服务制度对接、资源共享、福利均等、流转顺畅。对于河北省来说,落实社会保障,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提升京津冀经济实力的重要举措。

[参 考 文 献]

[1] 董栓成. 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4(5): 23-26.

[2] 王瑜,武继磊.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北京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综述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5(5): 34-46.

- [3] 程必定. 从区域协调发展视角看雄安新区的设立[J]. 区域经济评论, 2017(5): 26—29.
- [4] 郝寿义. 作为国家级新区的雄安新区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J]. 区域经济评论, 2017(5): 29—31.
- [5] 陈耀. 雄安新区:新常态下优化中国空间结构的战略棋局[J]. 区域经济评论, 2017(5): 32—34.
- [6] 郑真真,杨舸.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J]. 人民论坛, 2013(11): 6—9.
- [7] 张耀军. 京津冀城市圈人口有序流动及合理分布[J]. 人口与发展, 2015(2): 33—38.
- [8] 封志明,刘晓娜.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3(2): 3—11.
- [9] 陈建奇. 设立雄安新区的影响及战略价值[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7(9): 68—71.
- [10] 程恩富,王新建. 京津冀协同发展:演进、现状与对策[J]. 管理学报, 2015(1): 1—9.
- [11] 陆杰华,卢懿逢. 首都经济圈推进中面临的人口问题及对策[C]. 学术前沿论丛, 2013:184—193.
- [12] 闫程莉,安树伟. 中国首都圈中小城市功能的测度与分类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14(4): 88—95.
- [13] 庞世辉.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现状与面临的主要问题[J]. 城市管理与科技, 2015(6): 12—15.
- [14] 姜鹏飞,翟瑞瑞,唐少清. 区域异质性视域下京津冀产业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15, 37(7): 75—79.
- [15] 徐永利,赵炎. 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产业逆梯度推移策略[J]. 河北学刊, 2014(4): 214—217.
- [16] 周毕文,陈庆平. 京津冀一体化中的产业转移[J]. 经济与管理, 2016(3): 9—12.
- [17] 陈耀,陈梓,侯小菲.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产业格局重塑[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1—6.
- [18] 叶振宇. 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关系及合作途径[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89—93.
- [19] 徐永利. 雄安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 69—73.
- [20] 杨菊华.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5): 3—15.
- [21] 李一花,李静,张芳洁. 公共品供给与城乡人口流动——基于 285 个城市的计量检验[J]. 财贸研究, 2017(5): 55—66.
- [22] 魏丽华. 雄安新区:比较、借鉴与启示[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5): 61—67.

【责任编辑 郭玲】

A Study on Main Feature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Hebei Population Outflo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LU Jie-hua, GUO R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ccompani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rapid increas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the form of population outflow in Hebei province also shows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Generally speaking, outflow population in Hebei mainly flows to the areas with more developed economy or faster development, 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population flow i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propor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Hebei outflow population is higher, in particular the male proportion mainly in short distance flow.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mainly in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orderly outflow of population in Hebei Province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we need to tackle the negative problems caused by population outflow, such as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order to achieve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which is crucial to achieve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re is a need to promote urban construction, provide public services and ensure social security.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area; outflow population of Hebei; policy support